

親歷
歷史

丛书主编 李辉 向继东

我的 防艾路

高耀洁 著

一部惊心的
“血祸”
一段恸天的
“防艾”路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親 歷 史

一部惊心的“血祸”史 一段恸天的“防艾”路

她以令人敬仰的仁爱之心，悉心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她以理性的思考驱散着人们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恐惧；她以八旬老人的病弱之身和孤微之力，冲破重重阻扰和压力，最早揭开因商业性血浆买卖导致艾滋病蔓延的真相。

本书独家披露高耀洁的防艾经历和生活细节，很多资料和图片系首次公布。

上架建议 历史纪实类



定价：35.00元

我的防艾路

高耀洁 著

丛书主编 李辉 向继东

親歷
史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防艾路 / 高耀洁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4
(“亲历历史”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7107 - 7

I. ①我… II. ①高… III. ①高耀洁—回忆录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446 号

我的防艾路

高耀洁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出版策划: 钟永宁

特约编辑: 周筱赟

责任编辑: 谢海宁 段太彬

装帧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7107 - 7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关于“亲历历史”丛书

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对亲历了深刻影响社会、改变他人命运的重大事件者来说，更是如此，个人经历的自述，是整体历史的映射，历史的亲历者与历史的研究者共同书写着刚刚逝去的历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出了历史求索的当下指向和主观性，也说明了解读当代历史的意义。但今日不少国人，特别年轻一代，对当代历史往往陌生。他们可能对千百年前的皇朝故事说出一个子丑寅卯，但对几十年前的人和事，却不得而知或不予置信。国家文化认同和个人精神家园的建造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离不开家国历史的传承记忆。历史在当下断裂，文化的飘摇、信仰的迷失与物质主义的甚嚣，与此攸关。

历史亲历者的自述有利于还原历史事件和社会整体历史真相，有利于揭示社会变动时代的个体生命境遇和心迹，有利于展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也能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预期，随着亲历者的年华老去，他们这些珍贵记忆将如一坛陈年老酒，散发着岁月的芬芳。

无视亲历者记忆的主观性是不现实的，我们并不否定记忆的偏差，我们只是希望我们这些主人公的记忆，为历史解释提供多一种可能。

处于或接近风暴中心的人，才更能讲清风暴。列入亲历历史系列者，主要是当代重大事件制造者、参与者，影响社会进程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以及与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者。

纳入本丛书的每一种选题，或是叙述者对参与的某一或几件重大事件的记述，或是众多亲历者对某一事件、人物或现象的记述。文体均以第一人称形式呈现，可以是亲历者直接书写，也可以是亲历者口述、他人整理。忆述者描述当时的历史场景，直接记述过程本身和个人心迹。我们不希望将其写成个人自传或历史评论。

从历史亲历者的口中重寻读者最关心的历史往事，描摹历史的原色，彰显当代历史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将干瘪枯燥的历史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历史，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理想。期望有同好的历史亲历者、历史书写者和历史研究者以及关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人们，与我们同行。

出版者

序言

中国出了个高耀洁

■朱学勤

我与高耀洁相识，是因为与中原有不解之缘。“文革”期间插队去河南，在豫东盐碱地上生活过几年。犹记寒冬腊月，天一亮背起粪箩拾粪，走九里跨过省界，走到过山东曹县地面。后来与高耀洁教授见面，才知道那竟是她出生的地方。我去郑州她家，但见四壁萧瑟，墙上挂着一副对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地上、床上、过道处凡能插脚的地方，堆满了防艾图书和方便食品，等着打包邮寄。听她略带鲁西南口音的豫东方言，与我能说的河南土话同音，于是互称“老家只隔几里地”。

四十年前，我带着左翼激情去豫东，下乡第一课是请贫苦社员忆苦思甜，老人们说着说着下了道，控诉起1959年“合大伙”（办食堂）饿死人的恐怖岁月，干部连声在底下喊：“下来，下来！”那一声喊，将我的左翼狂热砸得粉碎。高耀洁接着这句话，说了另一个“下来，下来”的故事：



防治艾滋，人人有责。 贾俊生/摄

2001年9月30日，她到河南周口地区查访艾滋病疫情，返途中听说某村疫情严重，临时拐弯走进了这个村子。进村就听见有奶声奶气的叫声，略带嘶哑：“下来！下来！”循声走进一个门半掩小院，走到靠北的屋子，欲待敲门询问之际，出来一条大黑狗。这狗骨瘦如柴，叫了一声，返身回屋。她跟着那狗走进屋里，只见梁上垂挂着一根草绳，一个年轻农妇悬梁自尽。尸体脚下，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鼻涕和着眼泪哭喊，抓住梁上尸体的脚后跟在啃咬。

“下来，下来！”显然是那个只有两岁的孩子发出的，他是叫娘“下来”给他喂奶，却只够得到妈妈冰凉脚后跟，将脚后跟当乳头啃咬。那一天是中秋前夕，也是那年那月的最后一日，中原血殇，以一个孩子的嘶哑叫声在纪念第二天的节日，母与子生离死别！如此悲惨景象，大概只有在毛泽东同样是咏叹血祸的诗词中出现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不到两个月，那孩子也死了。

高耀洁告诉我血祸并不是起源于西方人理解的民众“性解放”。她与我讲了当年田间地头如何采血、卖血的细节，此后她也曾对作家阎连科讲过，后者将其写入小说《丁庄梦》（上海文艺出版2006年版）。阎连科的文学风格是魔幻现实主义，但这一细节却完全是写实：

一夜间，几百口人的丁庄村，突然冒出了十几个血站来。县医院血站、乡医院血站、乡政府血站、公安局血站、组织部血站、宣传部血站、兽医站血站、教育局血站、商业局血站、驻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配种站血站，八八九九，竖一块木牌子，写上几个字，来两个护士和会计，一个血站就建立起来了。

在庄头，在十字路口上，在谁家闲着的一间屋子里，再把原来废了的牛棚扫一扫，取下一块门板洗一洗，把门板架在牛槽上，摆上针头、针管、酒精瓶，再把抽血的玻璃瓶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这就开始买血、卖血了。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扔的都是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

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

（老村长李三仁）唤着说：“丁辉呀——我头晕得很，这天这地都在我眼前转圈儿。”

我爹说：“不让你卖你偏要卖。我提着你腿倒倒血？”

他就说：“倒倒吧。”

也就躺在田头上，我爹、我叔一人提了一只他的腿，脚在上，头向下，让他的血从腿上、身上朝着头上流。为了让他头上血足些，我爹我叔还慢慢提着他的双腿抖了抖，像提着洗了的裤子腿，抖着让水从裤腿朝着裤腰上流。

抖完了，把他的双腿放下来：“好些吗？”

李三仁就从地里慢慢站起来，走了两步路，回头笑着说：“好多了。我经了半辈子的事，还怕流这一点儿血。”

我爹我叔蹬着三轮就走了。

李三仁便拄着锄头又回田里干活了。

阎连科听高耀洁讲述上述细节，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是来自鲁迅笔下，来自“鲁镇”、“未庄”系列小说。但鲁迅想象力再丰富，也无法想象世间有如此真实景象——人如鸡鸭，“提腿倒血”。这就是我所熟悉的中原田间地头，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豫东乡亲父老？相比“我爹”、“我叔”、“李三仁”，那祥林嫂、阿Q、小T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正是这些亲眼目睹的悲惨场景，以及那一声声“下来，下来”，给高耀洁弱小的身躯注入顽强动力。她不是第一个把血祸说出来的医生，却是捅出这个消息之后（1996年），连续14年坚持不懈的人。《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中国在2008年有19712所医院。即使以每个医院只有20个医生为计，也至少有40万医生。而这40万人中，为这场血祸站出来说话的只有4个医生，十万分之一；4个医生中只有高耀洁教授面对14年来的艰难险阻，挺到今天。她走

过100多个村庄，访问过近1000个艾滋家庭；足迹遍布豫、冀、鲁、晋、陕、皖、湘、鄂、浙、苏、云、贵、川、粤、桂、沪16个省市。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患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给每一封信回信，没有让任何一个病人失望，这些信件集编为《一万封信》，已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她亲手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个。她的家每天接待来访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接待过58位。她自编、自写、自费印刷、自费寄出的防艾读物有130多万册。相伴一生的老伴郭明久医生于2006年4月去世后，她一度情绪低落，我把当月收到的稿费寄给她以致丧礼，她的回信竟是邮寄了几百本防艾宣传册，嘱我在大学生以及社区中分发。她不是没有钱，而是把国际、国内所获的奖金和个人积蓄、稿费、讲课费等总计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用在了血祸的救助工作上！

血祸蔓延惊天动地，危及种族血脉。她以八旬老人的孤独肩膀一人扛了起来。2007年，她到美国首府华盛顿领取“环球女性领袖奖”，那是她迄今在国际上获得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也是她第一次出国领奖。颁奖会上，一位未受邀请、自费乘机、自购昂贵门票、专程远途而来的美国乡间老妇人，握着高耀洁的手，急匆匆表达自己的钦佩，愿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赡养高耀洁晚年。凭着美国普通民众的直觉，她将高耀洁与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1910—1997）相提并论，说“高教授的工作条件比特蕾莎修女还要困难，高教授不仅是善良人，还是一个英雄”。

这位素不相识的美国乡间妇人，也许比我们本土知识人士更懂我们这里的“特色”，更知道“特色”下的高耀洁是如何艰难：

她本身是个残疾人。除了高血压、心脏病，她比正常人缺少一个重要器官——胃。她的胃在“文革”期间遭暴打损伤，切除了十分之九，而今不过是一截肠子一样的象征物。在上海，我见她走路有点蹩拐，才发现这位妇产科学教授竟然是我在豫东民间到处看得见的“大娘脚”——双足缠裹又放过。在参议员办公室，希拉里久久注视这双在西方看不到的脚，无法想象就是这双脚走过中国千里万里，山路、平路、沟沟坎坎，一步一步挨了下来。

她是一个妻子。当她在山东大学讲坛上为学生普及防艾知识的时

候，老伴病倒住院；当她在那里调查非法采血的黑血站时，老伴卧于病床乏人照顾；在她把关爱源源不断送给艾滋孤儿寡母的时期，老伴溘然去世。她是一个母亲，“文革”时儿子受她牵连，13岁曾被判刑关进冤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小女儿受她牵连，曾经失去工作，走投无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萨心肠和献身行为，至今对她心有怨忿。言及自己的亲人们，老人垂泪不已，私下里说：老伴是个好老伴，自己不是个好母亲。

2007年，儿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为抵押，给老人重重地磕响头，跪请母亲不要出国领奖。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没有动摇，她用那双给这个世界接生无数次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钊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此时此刻，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必还有另一幅母与子生离死别的真实画面，声声叫唤“下来，下来”。

“空气中弥漫着采血、卖血的气息”，这在特蕾莎修女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象的是，艾滋病在西方是“后现代病”，但在中国竟会在不知后现代为何物的前现代农夫、农妇中疯狂蔓延。高耀洁一再辨明，血祸不是因为“后现代”，而是肇始于90年代初“血浆经济”的兴起。她说穿了艾滋病的“特色”，说穿了“后现代”浮表下的“前现代”血写的秘密。

这一天终于来了。2009年8月9日早晨，我打开电脑，高耀洁发自大洋彼岸的一封电子邮件赫然在目：

我离开中国，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中原血祸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合上电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如受电击，久久无言。耄耋八旬，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风烛残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历史中，大概只有托尔斯泰83岁高龄在风雪中出走可以与之比拟。高耀洁也是知识分子，只是饱受儒家传统教育熏染。第一次与我见面，《诗经》、《论语》，脱口而出，整章背诵。不要说医学专家，即使在我认识的人文学界专业人士中，亦未见如此心诵故国古典者。她也83岁高龄了，这样

一个可敬可亲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见不着了？不再是乡音絮语，不再是《诗经》、《论语》，不再是“老家只隔几里”，而是一去两万里，桴浮于海，我们只能在飞机舷梯下等待她去国还魂之遗骸？

在丹麦，“皇帝没有穿新衣”，说出这一秘密的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人们世代记诵他；在我们，能说出这一秘密的却是一位耄耋老人，一个来自旧社会的妇产科医生。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层层病血淤积，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想起毛泽东对另一位医生的著名赞誉，略作改动后，表达我对她的崇敬：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离开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对于他的离开，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熟悉“老三篇”的人不难看出，我只改了两个地方，将外国人改为“中国人”，将“来到”、“去世”改为“离开”。我以为，这也是最好的书面推荐，谨以此向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推荐：中国出了个高耀洁，她为维护13亿人的血脉做出巨大贡献，她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人类和平的贡献，她理应获此奖，她是这一奖项的最好人选。

2010年12月19日
写于高耀洁八十三寿辰

目录

序言 中国出了个高耀洁/朱学勤 / 001

前言 血祸：国家的灾难 / 001

一 血祸真相 / 011

可怕的血祸 / 012

只因卖血惹祸端 / 015

输血走上不归路 / 020

艾滋病不是河南的“专利” / 032

二 揭开艾滋血祸的盖子 / 047

我怎样转变了对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看法 / 048

初查艾滋病疫情 / 052

揭开血祸真相的先锋 / 056

我揭开艾滋血祸的坎坷路 / 063

秘密调查南方五省艾滋病疫情 / 086

三 防艾宣传 / 091

编印防艾书报步履维艰 / 092

散发防艾书报过程曲折 / 109

四 救助艾滋孤儿 / 121

艾滋孤儿的生存状况 / 122

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刻不容缓 / 133

艾滋孤儿的苦与乐 / 138

五 防艾路上陷阱多 / 145

今后我还敢相信谁 / 148

假医游医危害广泛 / 157

我走上了被告席 / 163

一场“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闹剧 / 171

艾滋病防治，“既患贫又患不安”！ / 175

六 我和两位领导人的会面 / 181

和吴仪副总理会面 / 182

和省委书记会面 / 187

七 防艾之憾 / 189

防艾过时论 / 190

艾滋疫区官员欺上瞒下 / 191

“血霸”圈养“血奴”依然存在 / 194

非法采供血屡禁不止 / 196

采供血管理混乱 / 199

防艾宣传不到位 / 203

八 美国和菲律宾之行 / 209

美国之行 / 210

从美国回国后的日子 / 224

难忘的两次菲律宾之行 / 233

写给远方的朋友 / 241

后记 我不是“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 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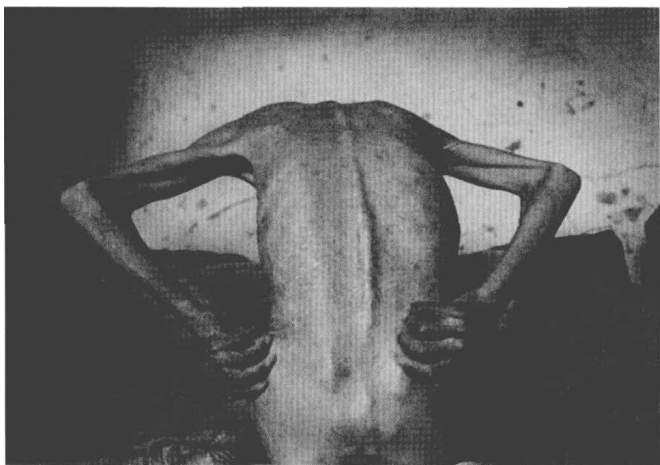
编辑后记 想你想得我肝肠断！ / 周筱赟 / 252

前言

血祸：国家的灾难

2005年9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企业高峰会上，首次公布了由世界经济论坛、哈佛大学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进行的调查结果，警告亚洲国家如果不采取保护性措施，将极易受到艾滋病的巨大危害。

这份题为《亚洲企业与艾滋病：扭转潮流》的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递增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全部省区都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在贫困农村地区情况最为恶劣。如果中国继续让艾滋病病毒以这种速度蔓延，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



皮包骨头的艾滋病晚期病人。 卢广/摄

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并未感到意外。我从1996年接触第一位艾滋病患者开始，走上防艾之路已十多年了，在此期间，我走过中原大地十余个县、数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过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收到过万余封来信，所见所闻令人触目惊心！在这十多年的日子里，我不知陪着那些无辜的艾滋病受害者流了多少眼泪，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在睡梦中被他们的惨状惊醒，醒来发现全身都是冷汗！

我见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他们走上不归路，几乎都是因贫穷而卖血或因疾病、外伤而输血。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96年4月7日，我见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巴秀英，她是由于做妇科手术时输血感染的。确诊结果出来后，她拉着我的手哭着问我：“俺会不会死？”我只能安慰她：“你好好休息吧，别胡思乱想了。”十多天后，她还是死了。她的丈夫、两个孩子以及陪护的亲属十余人经过反复多次的检测，HIV抗体均为阴性。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以为性传播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所以对此结果感到十分意外。从此，我对艾滋病开始特别关注起来。

渐渐地，我听说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省份也出现了艾滋病，很多人说那些人也有卖血或输血的历史。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得知某地一家人因“怪病”陆续死去，直至最后一名死者临终前才确诊为艾滋病。由此我觉得艾滋病传染性特别强，需要普及预防知识。于是从1996年9月开始自费编写防艾宣传资料，讲述艾滋病症状、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但多数内容是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仍以性乱、吸毒传播为主。这些材料印出后，我和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的几位馆员跑到汽车站、火车站和娱乐场所等处散发，遭到不少白眼和敌视，甚至有过多次被人轰走的经历。很多人认为只有道德败坏、行为不端者才会感染艾滋病，我们对他们宣传预防艾滋病，是一种“侮辱”。那时我也说不出更多的辩解理由，但我一直没有停止在防艾路上的脚步，不断编印宣传资料，用我的笔记录下中原大地上这段惨烈的艾滋疫情的历史，十多年中已编了27期，累计总印数达102万份。

到了1998年春，我又听说河南不少村庄的农民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我很想亲自去看看，但由于地点不够具体，找了多次都落空了。直至1999年8月，我忽然接到上蔡县检察院干部杜某的一封来信，告诉我他们那里就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不久后，郑州《城市早报》记者王芷荭从我这里得到这一消息，于11月前往多个艾滋村深入调查。199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天，该报发表了她采写的反映艾滋村真实情况的报道。

2000年3月18日，我约王记者一同前往上蔡县文楼村（现在已是海内外闻名的艾滋村，当时所知者还不多），给那里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送药送钱。此后我又陆续到过新蔡县东湖村、尉氏县曲楼村、柘城县双庙村等村庄，亲眼目睹了艾滋病疫情导致的种种惨状，令人胆战心惊！这些地方的疫情惊人地一致，艾滋病的传染源都来自大规模的非法采血。患者缺医少药，死者惨不忍睹，有些人家甚至已灭门绝户……面对如此重大的疫情，当地村干部还千方百计捂着盖着，禁止村民泄露消息，严防外来人员进村，还美其名曰“维护地方形象”、“促进招商引资”。由于不少省内外媒体公开报道了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情况，省有关部门某些干部害怕影响他们，对我揭露艾滋病疫情设置了重重阻力。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单位受排挤，另一个则丢了工作。而我最小的侄女大学毕业后，仅仅因为她是高耀洁的侄女，郑州没有一家单位敢要她。但作为一名医生的良知，让我实在无法在疫情面前保持沉默。我在世之日有限了，反正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我拼上老命也要揭开真相！不论面对多大的压力和打击，我一直都没有停止为这些血祸受害者呼喊，尽我所能帮助他们。但我的子女因为我而遭受不公正待遇，我对他们有愧疚。